

●世纪之交丛书●

● 秦海 / 著

高速增长中的经济转轨

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变』与跨世纪的发展战略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纪之交丛书

高速增长中的经济转轨

——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变”与跨世纪的发展战略

秦 海 著

吉 林 大 学 出 版 社

世纪之交丛书

高速增长中的经济转轨

——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变”与跨世纪的发展战略

秦 海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张显吉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东中华路 37 号)	长春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印张:16.375 插页:2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92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 7-5601-2027-X/F·418	定价:24.00 元

自序

从某些方面看，解释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发动原因以及“最终”的制度途向一直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选题。但是，这样的选题也一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难处。其一是对它的解释，既要求能够符合传统理论，又要求作者能够作出为社会广泛接受的理论创新。其二是这样的选题很难在一本书中得到清晰的描述，它是一个卷帙浩繁的巨大的社会工程。这一选题的诱惑和难处正是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孕育“述而不作”、成见、偏见、争论和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因所在。

本书的写作可能与这样的看法有关。本书试图成为的是那种只要读者能够耐心阅读的作品。在写作之前，我没有对自己抱有幻想和奢望。唯一可以表达的愿望是，通过书籍这一大家熟悉的形式把近十年的思考作一个总结。近几年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我开始重新“适应”以思考作为一个基本的生存方式，这一方式的一个明显的益处就是，它能够促使我保持一个平和的心境、稳定的心态和含蓄的社会选择态度。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一直“挖空心思”地体会到底什么是“为人生而学问”，或者说“为学问而人生”。后来，我发现这些考虑可能都是多余的。

关于本书的思考和写作，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因此，作为本书的序言，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向读者交待这些偶然和必然的因素。

之所以说是偶然的，这可能与我的职业和读书方式有关。1987年6月，我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随后就到国家信息中心工作。当时，我的任务是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承担单位组织和布置的经济研究课题。在国家信息中心，有一个比较优越的研究环境，领导我以及我的同事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是乌家培教授，同时，国家信息中心具有相对丰富的数据环境。这一研究一直持续了5年多的时间。随后，我发现的问题是，这种研究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及运用即存理论提炼实际的能力。一旦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写作欲望就大打折扣，而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花费在读书上。我知道，在职业岗位上读书，应该是一种“职业性”的读书，或者说是“选读”——读本专业的代表著述。然而，我的读书兴趣恰恰相反，是一种“泛读”，读杂书，尤其是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科学哲学等方面的书籍。当然，经济学具有优先权。结果是不出几年，我的写作兴趣“几近丧失”。读书成了一个状况，或者说一种唯一应该做的事情。

还需要向读者交待的是，我的读书态度和方法。在每读一本书之前，我总是怀着期待或恐惧。期待的是，读书能够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识别问题的能力；恐惧的是，如果被选读的书太次，则不仅会浪费时间，而且会影响自己的读书兴趣。我深知，一个人的理论修养和理论功底，最实际的提高办法就是多读书、读好书，摆脱做他人的“书奴”和“思想奴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曾经对此作过精辟的阐述，“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①按照我的思考，“思想奴隶”的要害是自以为是，

^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30页。

他总是被“最伟大的发现”所左右。凯恩斯在《通论》的结束语中，没有讲述摆脱“思想奴隶”的办法，他讲述的是“既得利益”与“思想”的威力到底谁大？“书奴”与“思想奴隶”相比，一个可供比较之处是，书奴是一种状态，思想奴隶是实质。说到底摆脱这些约束，根本出路在于多读书，无论是自己赞成的，还是反对的（甚至是反感的），只要能够读得下去，就索性坚持下去（干脆“不读书”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不读书所带来的麻烦更多）。这种说法的一个实在的意义是，无论对于任何一本书，在没有读完之前，或者是根本没有读，不能轻易地下判断，更谈不上引证和评论。正是在这种态度的基础上，我养成了一种“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的性格。对书的选择非常单纯和简单，拿到一本书，只要自己确认能够读下去，不仅会设法购买，而且会推荐给朋友。不论作者的出发点、方法论、价值判断和可能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抱负和追求，我自信的是能够把握住自己，而没有能力“干预”作者，同时，在我看来，一本书中的出发点、方法论、价值判断以及抱负和追求，那是作者自己的事情。我所能做的是，可以跟着作者走一趟，但是我自己必须能够回来。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一个作者把自己丢失了，跌陷在某个作者的逻辑陷阱之中。自然这样的读书，会使写作成为非常困难和没有时间做的事情了。

为什么我又讲写作这样一本书是必然的？我想也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一方面，近几年来——特别是在90年代之后，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论题，在这一论题下所积累的成果使绝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的转轨已经超出了一般经济学教科书安排的体例和可能容纳的内容。对于中国经济学家而言，中国的转轨和经济制度的变迁正在或必将为整个人类的制度变迁提供不可多得的、可供观察的案例。对这样的案例进行研究，在不同的经济学家看来，可以有多

种不同的描述。一时间,关于中国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的研究,构成了中国经济学建设和发展的“主流思潮”。另一方面,我个人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从事宏观经济运行的跟踪分析,发现有许多问题往往很难得到逻辑一贯的解释,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往往反映为非常突出的理论矛盾,而且这些矛盾甚至深深地隐藏在一些经济学文献的逻辑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问题的产生和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同时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到80年代后期,我开始有意或无意地接触到了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在严格的学科意义上可以说是转轨经济学家或者说是过渡经济学家^①,他们对中国经济学建设和经济运行的关注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日常的请教、交往和讨论中,大家都认为有必要采用新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就过渡经济学家的研究而言,我不习惯听到这样的说教,由于中国正“站在市场经济的门槛上”,或者说“已经到了市场经济的入口处”,西方的经济学家是在市场制度发达的今天,回顾和重新思考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学家却正处于市场制度的建设之初,判断和选择市场经济类型,前者处于一种经济制度的“结束”或高级阶段,后者处于一种经济制度的“开始”或初级阶段,因此,中国经济学家拥有更多的创新机遇。我想,这种说法可能过于绝对化了。假如我们

^① 最近,我正在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被描述为一组问题:什么是新制度经济学?如何理解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与旧制度经济学之间是否具有联系?如何解读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新制度经济学是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包容一切的范式”?在我看来,现在被中国经济学家称为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已成为一个思想性的概念,或者说一个惯用的标签。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扩张的结果,它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并不是任何经济学家都可能归类为新制度经济学家。他们的思想演化与旧制度经济学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思想路径。很遗憾,由于文献准备不足,这样的思考一直没有结果,我想,这样的问题是非常值得思考的,这种问题是你一旦想到,就忍不住一直就思考下去的问题。这个问题得益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马春文先生的启发,在此深表感谢。

大家一致认同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最为广泛的“人类扩展秩序”形式，那么作为市场制度本身可能就不存在终结，将它作为一种秩序来看待，划分一定的“阶段”，本身可能就不存在科学的基础。理论创新不存在“最后的一趟班车”。对于生活在中国本土并且以中文写作的人，关心现实的变化，形成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价值判断，比理论创新更重要。因此，一个既愉快又明确的任务就是描述中国经济改革既已走过的历程，而这个历程正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过程。一个忠实的记录本身，不仅需要理论分析，而且其本身就孕育理论，不断地为理论描述提供思想资源。

同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有一件事情是必须描述和交待的。1996年4月的某一天，我与我的朋友卢跃刚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家，作品有《以人民的名义》、《辛未水患》、《在底层——“自救年代”第一部》等等）作了长时间的“谈天”，可能是因为话题的选择过于兴奋——实际上，我们经常进行这种“职业式的聊天”，直至深夜一点才分手。同时，需要交待的是，我们居住得很近，相距不足1500米的距离。就在我分手15分钟后，我遭到了一群“身份不明者”的抢劫。一次围攻式的、明火执仗的抢劫。我的反应是要什么给什么，保证安全，迅速逃脱。结果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象的。当时，我处的位置是，在前方不足50米处是派出所，后方是卢跃刚的家。我不能无视事实，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我的瞬间反应是，由于后方是北京的十里长街，且临街是我的朋友的住处，我选择了向后方逃脱。后来由卢跃刚将我护送回家。这次遭劫，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第二天清晨，我就去报案，但是所有的结果都让我非常失望。在这次遭劫以后，唯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我快满2周岁的儿子，在随后的几日里总是试图安慰我，而我却不知道应该向他说明什么。抢劫的损失不仅是皮肉之苦，更为惨重的是，我当时将近10万字的手稿和“泛

读”的书籍被抢，以致于我花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未能从中“醒来”。经历了一个余月的惊悸以后，我对原来写下的文字作了调整，每一个章节都相应地增加了描述“传统”的部分。

我不敢说，本书具有一个严格的理论框架，只能说其中隐含着一些还有待进一步成熟的思考和判断。对于熟悉我个人和我的作品的人来说，这本书的写作既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近几年来，我自己的一个写作计划是忠实地描述中国的改革过程，或者说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过程。这一研究，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令我满意的名称。《高速增长中的经济转轨：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变”与跨世纪的发展战略》仅是一个开头。我最近正在从事的研究可以被看成是这本书的继续，因为研究的主要领域集中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景（1997年8月将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后者将更加偏重于理论的阐述，而本书更带有实证的意味。本书的主要任务是说明：中国经济的过渡与转轨是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行进的，这一行进中的过渡或转轨带有一定的不彻底性，“渐进式”改革战略越来越显露出其弱点，改革路径迂回所掩盖的摩擦和矛盾现在已经开始显露，如何扬弃渐进式改革战略将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动力来源。我的结论是，中国经济的过渡与转轨必须从经济增长型过渡走上经济发展型过渡。

仅就我个人的知识准备、理论判断和对实际经验的概括提炼而言，我不敢自诩，在本书中我发现了什么，或者说形成具有足够理论威力的“阐述体系”。在我看来，不管是概念或者是方法论，还是理论体系，只有在弄懂、弄通的前提下，才可能谈得上理论判断和理论选择；在我看来，从读书进而写作，总得要大量地阅读同仁们的文献，这些文献无论你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应该不由自主地阅读，然后才可能为对话、交流、讨论和引证以及自己

的理论思考开辟道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足够的理论耐性、研读能力和识别能力等，就可能纯粹浪费时间和精力，到头来形成理论厌倦和反感。从这个意义上看，先哲们说过的，“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是具有一定的“欺骗”性的。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的感悟是一种喜悦和幸运。因为这个时代面临着大量的没有被阐述透彻和表述清楚的问题和现象，因为这个时代不再容忍学人们从事“知识负增长”的研究；同样，因为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理论发现、应用和创造；因为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关怀和体恤……生活在这个时代，一个人不根据自己的禀赋、偏好和专长做点什么，可能是说不过去的。我现在所做的，就是我所想做的、能够做的，当然，更准确地说，是应该做的。

以上的话，首先是为我自己留下的一个应该保留的记录，其次也是我必须向读者交代的整个写作过程——包括在写作过程中的一些思绪和情感。我想，读完这本书，读者与我之间应该产生共鸣。如果读者从这本书中发现一些不足之处，或者得到了一些体会，那应该说是对作者的最高奖赏。无论是褒是贬，都将为作者提供新的机会。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应该感激和必须感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在此，我只能写出必须感激的人，而将那些应该感激的人保存在我的内心。首先，我必须感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宇燕博士，是他向吉林大学出版社张显吉先生推荐，才使得出版社接受了这样的选题。其次，我必须感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平博士和中国青年报新闻中心副主任、中国著名报告文学家卢跃刚先生，在我写作期间——特别是在我遭受抢劫的那段时间内，他们不断地给予我勇气和鼓励。同时，我衷心感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张曙光教授，我曾经向张教授请教过与本书有关以及与本书无关的许多理论问题，他都诲人不倦地予以解答。我也必须感激国家信息中心的许多领导和同事，他们是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乌家培教授、国家信息中心信息经济与技术研究所所长张元生高级工程师、国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郑秀华高级工程师，以及我的同事步德迎先生、李云林副研究员、李宝民先生、李红梅小姐等。他们给予了我一个非常友善的讨论环境。在写作期间，我时常参加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双周学术讨论会”，并就我所考虑的问题向与会的盛洪博士、茅于軾教授等进行讨论，我也时常从天则经济研究所借阅文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妻子徐颖女士的百倍呵护和关心。她作为中国统计出版社的经济学编辑，她的知识和专业眼光不仅是一种激励，而且是一种“有言的讨论”。在本书写作期间——尤其在我手稿被劫的那段时间，我2周岁的儿子，他正处于一个非常好奇的、贪玩的年龄，却时常陪伴我，一些幼稚的儿语问候，给予我的绝非仅仅是勇气和创作的激情。本书所包含的劳动虽然是我付出的，但是正是由于他们使我的写作得以持续，我将本书献给我的妻儿。

我还要衷心感激吉林大学出版社的张显吉先生。为了本书的选题、写作方法以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我们从来没有间断过讨论，他数次来北京，总是率先与我讨论本书的写作问题，提出他的建议。本书没有他的努力，可能就不会付梓。作为责任编辑，他更像一个合著者，他的劳动远远超出了一个责任编辑所应该承担的那一份。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采用了脚注和最终文献索引的引证办法。对我而言，这样的做法有两种寓意：一是读者可以从中注意思想线索，二是我们必须针对文本进行写作。针对文本进行

写作的意义是，一切记录在案的文献都是我们必须明确对待的，舍此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讨论的前提和依据，同样，也体现了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

本书所有的不足之处和弱点，不仅与上述列举的感激人士无关，而且与被引证的文献无关，完全由作者负责。相反，本书可能具有的价值应该由出版社、读者和作者共同分享。

中文摘要

在20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过渡经济”已经两次出现在中国经济政策调整的框架之中。第一次出现在50~60年代,主要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经济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战略和制度路径选择的错误,结果导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出现在80年代以后,主要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第一次过渡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强调计划,而忽视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致使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没有活力,而且形成了严重依赖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二次经济过渡,不仅强调继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且强调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充分利用计划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本书研究的就是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过渡与转轨过程。

从一个严格的时间界限上看,中国第二次经济过渡时期起始于1984年10月。我们之所以不选择1978年12月作为时间分水岭,不仅是因为当时没有实际的“改革行动”而仅有改革纲领,实际上,改革纲领也是“投石问路”式的,许多重大的理论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分歧都是在1978—1984年这一段时间内才解决的。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特征是体制性过渡,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举世瞩目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纲领性文件,确定了“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的改革路径,扬弃传统的体制性遗产,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的发展战略目

标。

但是,由于这一过渡时期的战略纲领并没有明确体制过渡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的直接联系,遂致使在1984年以后就出现了各种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经济波动。1984年农业生产大丰收后,因为“卖粮难”、“仓储危机”和农产品的低价订购,农民比较利益开始觉醒,部分农民开始从农业——特别是从种植业中退出,从事“离土不离乡”的经济活动,粮食生产开始滑坡,直到1987年后农业生产才有所回升^①。1988年因经济运行“过热”,导致掩藏在“双轨制”经济运行中的通货膨胀显性化,当时的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8.5%,最高时月通货膨胀率与上年同期比高达27.1%,1988年8月中旬出现了席卷全国的“抢购风”,京、津、沪、汉、渝、沈等35个大中城市带头,抢购金银首饰及彩电、冰箱、地毯等高档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最后连一些日用消费品——如食盐、服装等都成为抢购对象^②。这一后果使居民储蓄存款急剧下降,人心恐慌。这一轮经济增长的波动导致了“治理整顿”和经济运行持续了一年多的“市场疲软”。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以后,中国经济的过渡迅速地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这一过渡时期的政策分水岭是以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的。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取向更加明确。在这个特殊的过渡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在高速度、高预期、

^① 秦海(1995):《中国的粮食问题:供给、需求及其未来的粮食安全》,《金三角》杂志第4期。

^② 谢百三(1995):《中国局势为何处高通胀而不乱》,《长江经济导报》1995年9月30日。

高投入和高通胀的基础上综合启动,它不仅释放了因“治理整顿”所抑制的经济增长潜能,而且也在广泛的国际背景上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关注,外资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已经放松产业管制的产业领域。但是,这一轮的发展却一直伴随着高度的通货膨胀和超计划的固定资产投资,致使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在整个“八五”计划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当年价格计算)年均增长35.4%,其中1992年和1993年分别高达42.3%和58.3%,整个“八五”计划期,无论是投资增长速度,还是在建总规模的扩张速度都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显然,上述的两个时间段的划分代表了中国第二次经济过渡时期的不同阶段,即第一阶段是1984—1992年。第二阶段是1992年以后^①。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释这两个不同的过渡阶段?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共同性,以及过渡的可持续性是否会被打断?应该运用何种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第二次经济过渡和转轨?

从现实的理论看,过渡与转轨类型的研究,现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原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专业经济学,被称为“过渡经济学”或者是“转轨经济学”。按照世界银行对转轨的定义,“转轨”包含“实现发展战略的一个或两个重大的变革:从保护走向与国际市场更大的一体化;从大量的政府干预走向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政府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要小得多”^②。关于转轨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建立在对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

^① 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阶段的划分是存在争议的。一种通常的理解是三阶段,即1978—1988年,被称为改革启动和逐渐加速阶段;第二阶段是1988—1992年,被称为“治理整顿”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没有新的改革措施出台,而且似乎有所收缩;第三阶段是1992年以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不同意这种划分方式,因为在1988—1992年这段时间内,改革没有“收缩”也没有“前进”,可以看成是第一阶段的延续,所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行政手段得到暂时的加强。

^② 世界银行(1995):《一体化世界中的劳动者: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的批判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反思的基础上的,它以亚约瑟·科尔内(Janos Kornai)、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大卫·李普敦(David Lipton)等人的理论为代表。它们重点研究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的过渡过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特别是以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渡为重点,以期归纳具体的转轨路径,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过渡案例;第二类是以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理论为代表,主要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他具体研究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形成和完善过程,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将交易费用理论引入了经济增长过程,形成了诺斯所谓的“超凡入圣(或者说囊括一切的)的范式”。实际上,这种研究的最具特色理论是,交易费用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科尔内的研究所包含的“核心概念”是“突进和和谐的增长”及“初始化理论”。他在《突进和和谐的增长》一书中提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始终受“两种灵魂”的支配,一种是“快上加快的增长率灵魂”,另一种是“计划和谐灵魂”,对于前者是赢得制度优越性的最重要的依据,也是衡量优越性的唯一指标,但为了保证“快上加快的增长”必须要求“计划和谐灵魂”,即中央计划部门制定无所不包的计划,来维持所需要的增长率水平。然而这种增长很快就会受到计划理性、需求约束和资源约束的限制,因此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都基本上属于需求约束和资源约束型经济。因为资源约束导致了大范围的短缺和“排队”现象,而需求约束又导致了普遍的“囤积”和“滞存”现象。科尔内认为造成这种增长弊端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私有产权,“只有私有产权才能提供足够的激励,才能保证资源的充分利用”,因此必须进行所谓的“初始化”(beginning

theory)^①。

对转轨的案例研究首推“休克疗法”的始作俑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和大卫·李普敦。按照他们的说法,“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所有成功的经济都在向大致相同的经济制度迈进,即共同地以市场、可兑换货币、私有制、合股制、开放性贸易等基本内容为基础。这是一种制度趋同的过程”。同时,萨克斯强调,“过渡的时机和速度,必须考虑宏观经济的稳定,制度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②。基于这种认识,萨克斯为原苏联、东欧国家和部分拉美国家制定了“大爆炸”(Big Bang)的转轨战略。

新经济史和新制度经济学对转轨的研究是从经济发展史入手的。他们认为之所以一些国家取得经济成长的成功,走上经济高速增长的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却长期陷入社会僵化的深渊,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是制度变迁的隐函数。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共同的制约因素,一是复杂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二是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前一种状况要求制度的设计必须尽可能与市场的复杂性相吻合,以保证制度实施的可行性;后一种因素总是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和偶然性的影响,但是只要制度变迁的方向能够给人们带来报酬递增的效果,最终就会出现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如果制度变迁能够带来社会收益递增,这被称为相互依存的路径(Path Dependence),当报酬递增普遍产生时,制度变迁不仅得到支持和巩固,而且会在此基础

^① 亚约瑟·科尔奈:《突进和和谐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的思考》,中译本,张晓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短缺经济学》(上、下册),中译本,张晓光等译,高鸿业校,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Janos Kornai,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Example of Hungary"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匈牙利转轨的案例研究》),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② 萨克斯、梅俊杰:《休克疗法与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